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

政党政治与新闻党性原则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史的理论反思

吴 风^{1 2}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2. 南开大学传播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文章以新中国六十年新闻史为基本考察对象, 将政党政治与新闻党性原则联系起来, 重点探讨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 并以政党政治的兴衰作为理解中国新闻史的一条理论路径, 并由此作出相应的历史解释。文章的理论核心要点是: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政党政治思想价值体系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文化艺术各领域, 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由“政治化”向“去政治化”的转变, 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在此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改变。

关键词: 政党政治; 去政治化; 党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3)02-0119-06

新闻党性原则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成为新闻史探讨的问题具有双重的理论涵义: 一方面这一研究路径将政治与历史的维度引入新闻事业的考察过程中, 更加契合新闻事业发展的复杂背景, 另一方面它拓展新闻理论研究的思想空间, 将新闻理论问题与丰富的历史、政治思想资源相结合, 寻求新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在传统新闻理论研究中往往被抽象为若干条目, 未能展现出这一新闻理论命题与历史运动过程的有机联系, 从而缺乏应有的理论说服力和对于生动、鲜活的社会现实的回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 新闻理论研究必然要求历史性和当代性、新闻与政治、理论逻辑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统一。

一 党性原则的双重维度

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成立之初就将报刊作为自己的思想阵地和精神旗帜, 尽管党报被马克思称为“喉舌”, 但按照学者陈力丹的分析, 中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喉舌”一词并不包含被动的、有机的意思。^[1] 这也就是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报刊视为政党体制内的功能性单位, 而是将报刊视为能动的主体, 它始终引领和不断激发政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伦理, 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意义上不断的再生产自身。无产阶级党报的政治性来

自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激发, 而并非源于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构成, 后者是以前者作为前提条件的。在政党与党报的关系问题上, 恩格斯认为政党必须保持内部意见和观点的自由讨论的氛围, 他将其称为“党内同志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2] “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 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 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 就显得不合时宜了”。^[3]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党报的性质和功用也有着历史的、辩证的考虑, 列宁主张“机关刊物就必须反映出一切不同的观点, 一切地区的特点, 一切多种多样的实际做法。”“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 相反, 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4] 针对一些党内同志担心公开斗争会被敌人利用的心理, 列宁在一封信中鲜明地指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 没有斗争的分歧, 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 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 那么……它将快一百倍的促成牢固的统一”。^[5]

列宁赋予俄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物的党性原则至少包含理论和现实双重维度。一方面, 列宁肯定无产阶级出版物的党性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政治事

收稿日期: 2012-09-15

基金项目: 天津市社科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TJXC10-630)

作者简介: 吴 风(1978-), 男, 江苏盐城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南开大学传播系讲师, 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业、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需要的是不断的理论争辩和思想斗争,使得政党保持自身的思想活力。另一方面,列宁面对的是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内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这是马、恩等早期无产阶级思想家未曾预料到的情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的不仅是思想上的统一,更需要行动上的一致、组织上的一律,这些也被列宁纳入了党性原则的范畴。

如何在党性原则的理论和现实层面保持良好的动态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一方面,只知道高扬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旗帜而不懂得结合具体的政治现实做出应对策略,结果不是空头理论就是本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党性原则作庸俗化理解,只强调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观点一律而忽视政党本身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价值,遗弃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承诺,压制党内的理论争辩的政治活力,则政党也必然会丧失其政治本色,其结果不是政党的瓦解就是蜕变。

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提出党报党性原则的起因是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的问题。《解放日报》报社人员大多数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人,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充分理解战时农村根据地环境下党报的特性和任务,一味搬用国内外某些大报的具体作法,追求“独立性”。在《解放日报》的宣传报道中,很多观点和中共中央的政策相抵触,形成了第二个发布权威指令的机构。鉴于这种情形,毛泽东明确要求:党报要增强党性、联系群众,前者要求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放在首位,后者要求贴近根据地群众的需求,要将《解放日报》办成一份“真正的党报”。此后《解放日报》发起改版,其目的就是将“同人办报”习气根除,确立党报的党性原则。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所要求的党报的党性与列宁所表述的党性内涵有一定区别。列宁所针对的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分散的情形下滋生的派系小组习气,俄国党的问题是党内思想分歧严重,报刊基于派系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发表观点。毛泽东强调的报刊党性原则主要是基于报纸在日常工作中未能体现出党报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要求。毛泽东要求党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其成为党的方针政策的传达通道,克服报社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在建国之后,毛泽东对党性原则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已从革命战争转移到了和平建设上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

说,保持党内外意见沟通特别是批评建议的畅通是极为重要的,政党的政治实践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活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政党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的必要途径。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该文件特别指出:“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的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6]此后,毛泽东屡屡提及的“双百方针”的出发点也是如此,但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这些正确的做法未能在全党保留下来。

对于党报的党性原则,毛泽东的理解同样是有着两层考虑的,一方面在思想上党性原则体现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全党共同信守的生命线。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体制上要求的党性,它要求新闻事业作为政党领导政权的精神中枢引导舆论、统一思想,成为政党政治机制的有机构成。1957年《人民日报》曾因为报道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过于迟缓,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因此遭受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称其“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由此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党报从来都不是党报编辑部的专属事业,党报的真正主体是全体党员。党和党报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上下级的工作指导关系,而是彼此互动、相互交融的新型政治关系。党报链接政党工作,政党灵魂贯穿党报。党报的办报者不能只具备一般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还必须有着对政党政治的透彻理解和敏锐把握的能力,要以政治家的素养通过党报开展积极能动的新闻工作。可以说,毛泽东对党性原则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打通思想和现实的两重维度,这一思考充满了哲学的辩证意味,也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关于党性原则的丰富阐释和设想并没有得以贯彻实施,在党性原则中存在的思想和现实层面之间的矛盾张力不仅未能消除,相反在现实中导致了悲剧的一次次重演。另一方面,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仍然缺乏对党报党性原则的创新思考和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继续重复“耳目喉舌”的相关论述,不仅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并且也难以由此问题出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事业寻求自身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

二 党性原则的历史困境

1949年在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民”政治话语尤其值得注意。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其中提到“旧有报刊中也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的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的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共产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在这里提到的“人民”概念不同于旧政治所谓的“臣民”或“民众”,而是带有鲜明的政党政治色彩的全新范畴。“人民”的概念至少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新政权的主体范畴,它建构了新政权的政治正当性,它并非传统旧政治所理解的、被政治精英们安排和摆布的对象;二是人民的概念并非自然存在的客观表述,它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政治范畴,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密不可分,它直接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和政治价值(毛泽东发表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已然有了这样的思想)。人民的主体性是从革命运动中萃取出来的,它是形成中国共产政党政治价值的核心要素,也是这段时期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根基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国之初的几次关于文艺路线问题的大讨论才显得尤为重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对电影《武训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和大讨论。从《武训传》的批判过程来看,毛泽东之所以写下那篇带有强烈质问语调的文章,正是希望通过这样强有力的触动扭转旧文艺路线、确立新文艺路线。许多论者对于政治干预文艺的方式总是习惯性的持否定态度,似乎政治是压制文艺创作自由的原罪,但殊不知社会主义中国面向工农阶级的共同的文化创造和体验过程恰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成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和政治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武训传》的批判干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而是陈旧的文艺路线,批判的目的不是压制文艺创作的自由,而是通过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价值内化于文艺创作过程,树立社会主义新的文艺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价值包含着对工农大众地位的标举,视他们为旧世界的毁灭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视他们为新国家、新政治、新文化的主人。

根据学者汪晖的分析,当代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起政党-国家体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和价值传统,它包括“土地革命建立起农民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形成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建立起主权的共和国家;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成为革命建国的前提。”^[7]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农民的阶级主体性、没有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则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结果都将大不一样,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反复阐明的新文艺路线的全部内涵。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的文艺路线不仅包括用文艺的形式表述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更是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重建工农阶级的主体性意识,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揭示他们真正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地位,使无产阶级获得思想的彻底解放,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人,这实际上也就是文艺路线之中党性原则的全部内涵。

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同样是建国初期新闻史的重要事件,《人民日报》的此次短暂的改版尝试尽管随后中断,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值得深究。有研究者反复引述《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中的“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说法,试图说明《人民日报》改版的最大价值在于彰显了“读者需求”的本位意识,但在更高的逻辑层面上,此说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人民”的概念不是单纯的“读者”概念,如前文所述,“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政治范畴,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人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和政治意义,将“人民”简单的等同于“读者”直接消解了“人民”这一概念丰富的政治意涵,从而将此问题迅速的“去政治化”。

正如目前传媒和学界热捧的所谓“受众”概念,似乎可以与人民、群众等概念互换使用,加拿大传播学者莫斯克鲜明地指出“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和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而是传播产业自身的一个产品,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如果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的模糊媒体在构建社会分野中的角色。换句话说,“受众”这样一种全称型的话语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隐晦的政治表达,它意味着媒介只为其市场上真正消费其媒介产品者提供服务,而那些不被广告商重视的非目标消费者群体同样也被排除在媒介传播策略范围之外。如传播政治经济

学者赵月枝指出的,在决定何种内容能够进入传播范围的问题上,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元一票。

1956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在特定阶段过后即将达到的目标,而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中共八大决议中对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说法后来也不被毛泽东认可。按照胡绳的分析:“(八大)决议的意思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已经基本上扫除了,因此这时候人要干什么都可以干成。……但在这个前提下,毛主席还有点保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后来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8]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背后都存在着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考虑,然而在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政治运动的发展变化不可避免的与国家权力、官僚制度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运动迅速的蜕化变质。党内政治活力的丧失与官僚主义的泛滥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是“大跃进”最终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深层次原因。无产阶级政党发动的政治运动召唤群众参与,但从历史表现来看,政治运动客观上要求高度的思想、步调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政党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和权力运作,因此,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往往是以牺牲群众的主体性为代价的。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政治悖论和实践困境。正因为如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虽然是作为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被确立下来,但是“四大”并未真正的发挥民主机制的作用,相反,它往往取消了基层群众的主体性意识,代之为政治精英的话语表述,换句话说,它并未成为自下而上的民主活力,而蜕变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

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路径不同,建国初的三十年表现出明显的理论思想力量引领和推动社会整体进程的方式。如同马克思在谈论德国革命的矛盾时所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10} 新中国的

最初三十年在理论思想和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张力和互动关系成为这三十年历史中各种重大转折的内在动因,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9]15}

国家政党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的遵循现代民族国家通常采取的权力秩序框架,一旦这样的权力秩序被固定下来,则意味着国家政党化开始向政党国家化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党报成为嵌入在政党-国家权力秩序之中的结构性环节,缺乏自身的政治能动性。党报并非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制的一部分,从而不得不遵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秩序,丧失了其作为社会主义参与性民主机制的可能性。毛泽东曾一再倡导的“政治家办报”是一种理想境界,问题在于,政党国家化的政治进程只会孕育出政治服从的技术官僚而并非富于远见的政治家。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首先意味着它作为政党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的承载者,其次它还是政党政治的实践者。也只有深刻体认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价值伦理和历史要求,党报的党性原则才是有灵魂、有活力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办报”才成为可能。

三 去政治化的党性原则

1976年“文革”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的终结,而且深刻的象征着20世纪中国革命年代的落幕。国家政治生活不再围绕政党政治展开,而是寻求更为宽泛的价值理想,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作为8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命题。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依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新闻学者都承认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长足进步,但也不能无视社会主义政治传统要求的党性原则。这也使得新闻事业的改革历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内在的紧张。

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完成了领导层的权力交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文革”遗留的思想意识问题进行清算,在这方面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辩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文革”尽管是一场涉及复杂的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政治运动,但长期的运动扰乱了社会秩序、阻碍了国家发展,大批无辜者为之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社会思想动荡不安,经济民生发展滞缓,在这种情形下,人心求变成为社会整体的大趋势。尽管“文革”本身的政治初衷、前瞻思想需要和“文革”中派系林

立、权力斗争等“去政治化”的现实表现区分看待,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样的区分缺乏现实可能性。胡耀邦本人虽然也曾表示“文革”的“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10],但这样的历史辩证思想没有延伸到后来的政治讨论之中。

80年代与其说是时代的崭新开启,不如说是革命年代的尾声余韵。随着对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彻底否定,在务实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新的国家发展路径和政治逻辑。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和公开的政治辩论被新时期党的领导者当作政治运动的产物而摒弃。邓小平所说的“团结一致向前看”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不要“算旧账”,甩掉历史包袱,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最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终结;二是党内要始终保持政治路线的高度一致,摒弃路线斗争的做法,将经济建设置于党的工作的中心地位。重要的是,在历史转换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并未对以往政治运动导致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政治迫害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而是将一切与政治运动有着形式上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政治产物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剥离出去,从而回避和拒绝了党内思想争辩的可能性。

80年代之后国家通过修改宪法的契机最终将“四大”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通过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清除精神污染,党内外基本实现了政治意志的高度一致。这些做法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是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对于国家开拓新的发展路径有着重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必然以某种代价作为前提,“埋头发展”、“不争论”固然避免了政治内耗,造就了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所要求的政治辩论和政党政治活力受到抑制。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其实都伴随着的党内外广泛深入的辩论和思考,这一过程对于保持政党政治的生命力至关重要。一概的拒绝争论实际上窒息了政党的思想活力,也丧失了政党本身的纠偏和创新的重要机制。或许在短时间这样的政治代价不会凸显出来,但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急速膨胀,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价值将会遭遇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回顾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难看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成功地后来的改革破除了思想阻力,也为1981年的“历史决议”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此篇文章所持观点与中共高层新一届领导人

施行新政的需要相契合,因此往往被后来者视为“一声春雷”,此后的中国新闻传媒很少在公共的言论空间针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辩论。“实事求是”在80年代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被一再强调,这固然是扭转极“左”政治路线、破除思想樊笼的利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指标、个人收益成为社会追逐的核心价值,“实事求是”的口号又不免被庸俗化,成为回避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话语。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实践”的含义被简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的数字可以直接作为政治论据,从而消解了一切政治思想争辩的可能性。

80年代既是一个时代的崭新开启,同时也是革命年代的尾声余韵,在务实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新的国家发展路径和政治逻辑。革命年代作为常态的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辩论在80年代之后已然很少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时期,邓小平所倡导的“团结一致向前看”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不要“算旧账”,甩掉历史包袱,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最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为标志而告一段落;二是党内要始终保持政治路线的高度一致,尽量避免党内的路线斗争,确保经济建设被置于党的工作的中心地位不动摇。重要的是,在历史转换的关头,思想理论界对以往政治运动导致错误扩大化的深层次原因缺乏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在许多人看来,一切与政治运动有着形式上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政治产物都与改革时期的社会精神主题不相符,因此也难以开展与之相关的公开讨论。

在“发展”与“稳定”的政治逻辑作用下,一些重大的、涉及根本问题框架的理论思考和政治争辩的声音被有意识的孤立和漠视,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分歧往往只是关于现代化道路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尽管执政党通过控制新闻传媒能够实施有效的舆论导向,树立新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公共议题,但回避争辩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将真正的政治危机留待将来去解决。

80年代新闻界探讨的诸多话题看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新产物,但许多议题的思想源头仍然在80年代之前,例如曾引起争议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提出有着双重的思想背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中的种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往往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80年代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必然导致思想价值观

念的强烈反弹,它们形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强烈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大门被开启,社会价值观包括政治观念都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时期,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

从世界范围来看,80年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衰退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同面临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难以掌握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在19世纪之后,无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它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时代一直以可耻又可笑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政治强人和经济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看做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贵族、文化贵族、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11]经历了60年代的政治运动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主义和“左派”阵营掌握的文化领导权旁落于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话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一情形下,社会主义成为被拷问的对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则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原罪受到审判。80年代中国的许多理论争辩的背后实际上都隐藏着这一世界政治思潮变革的深刻背景。

8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尽管以种种方式强化了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四项基本原则),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仍然持续的衰退。理论的务虚固然重要,但如果为了消弭意识形态的争论就回避公开的理论争辩,这样的务虚非但不能激活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相反它只会将政党政治最为核心的精神资源抽离出去,从而使理想高挂、信念空悬、社会物欲流

动、精神集体萎缩。在经历了短时期的思想统一之后,由于内外各种社会要素的影响,思想意识的分裂、分歧在所难免,其中不乏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思潮。在去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无产阶级政党争夺文化领导权将变得极为困难。这一点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表现的愈来愈明显,尽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文化事业和新闻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视听率、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等数字并不能等同于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的共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何以能够通过新闻事业的长期实践使其获得不断的巩固和更新,这一点也正是新时期党性原则的落脚点所在。

参考文献:

- [1]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5-56.
- [2]马恩全集[M].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09.
- [3]马恩全集[M].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7.
- [4]列宁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8-289.
- [5]列宁全集[M].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2-63.
- [6]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M].中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23.
- [7]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8:2.
- [8]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J].中央党史研究,2002(6):65.
- [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
- [1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M].上海:三联书店,2006:10.

Party Politics and Party Principle of Journalism: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Journalism History of PRC over 60 years

WU Feng^{1 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journalism history of PRC over 60 years as its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puts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politics and party principle of journalism. A research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party politics is treated as a theoretical path to understanding the journalism history of PRC. The main theory poi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CCP's thought value system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journalism which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politicization to de-politicization.

Key words: party politics; de-politicization; party principle

(责任编辑 李雪枫)